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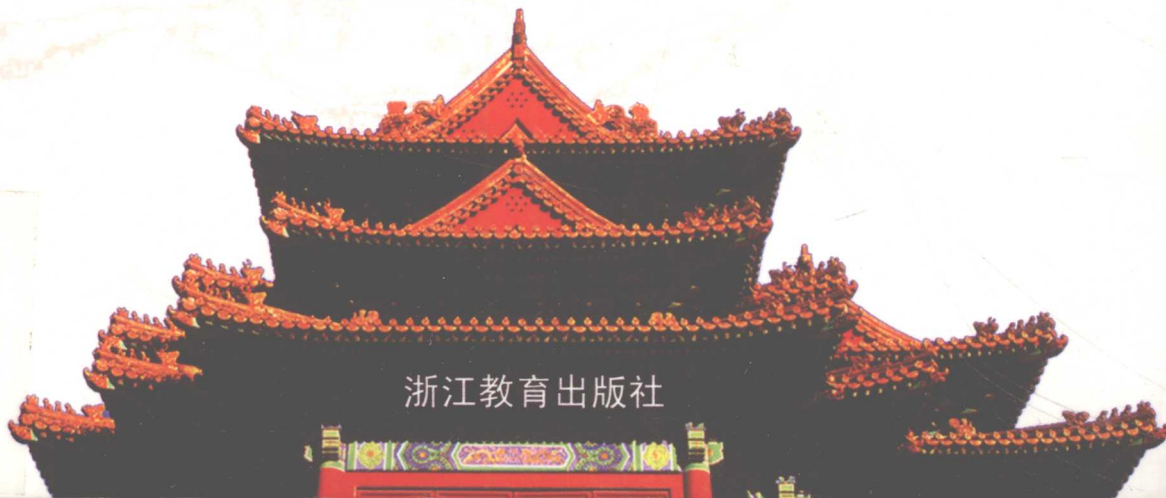
ZHONGGUOCHUANQIXILIE

中国传奇系列



鉴真传法东渡记

余大庆 著



浙江教育出版社

鉴真传法东渡记

Jianzhen Chuanfa Dongduji

余大庆 著



浙江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鉴真传法东渡记/余大庆著. —杭州: 浙江教育出版社, 2008.3

(中国传奇)

ISBN 978-7-5338-7404-9

I. 鉴... II. 余... III. ①鉴真(688~763)—生平事迹
②中日关系—文化交流—文化史 IV. K203 K313.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5589 号

鉴真传法东渡记

著 者 余大庆
责任编辑 王晴波
装帧设计 王 坚 王丽卫
责任校对 雷 坚
责任印务 陆 江
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
(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:310013)
激光照排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20×1000 1/16
印 张 10.75
字 数 211 000
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
印 数 0 001-5 000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38-7404-9
定 价 32.00 元

联系电话:0571-85170300-80928

e-mail: zjjy@zjcb.com

网 址: www.zjeph.com







目录

CONTENTS

1. 十年浩劫中的一个奇迹	6
2. 为什么是鉴真	22
3. 大师成长的历程	38
4. 来自日本的邀请	70
5. 九死一生的征程	88
6. 最后的岁月	130
7. 永未完结的航程	160
后记	170



Shinian haojie zhong de yige qiji 十年浩劫中的一个奇迹

鉴真东渡为日本带去了盛唐文化，日本人对他的恩情没齿难忘。但在故国，他却沉寂千年。直到近代东亚的国际格局发生逆转，往昔野蛮落后的倭奴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民富国强，吸引了大量中国留学生，鉴真才又进入国人的视野。上个世纪中叶，因中日邦交的需要，宣传、介绍、研究鉴真成为显学。即使“文革”大潮扫荡着“宗教迷信”的时候，鉴真也能奇迹般地保护他的寺院免受破坏。我们不妨从这件奇迹开始讲述这一段传奇。



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内乱,大量寺庙被砸毁。在古城扬州,

却有一座寺庙不但没有受冲击,甚至还能大兴土木。这座寺庙就是大明寺,“文革”期间在这里兴建了鉴真纪念馆。为什么大明寺可以例外呢?



经历过的至今心有余悸,没见过的一直莫名所以。这就是上个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十年浩劫——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,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,“破四旧”运动开始了。所谓“四旧”是指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和旧习惯。由于当时对于“新”和“旧”的概念没有科学的标准和正确的态度,加之红卫兵的盲目和无知,“破四旧”变成了砸文物、打人、抄家的同义词。

1966年6月1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,提出“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、旧

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”的口号,将“破四旧”列为“文革”的重要目标。同年8月,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后,全国各地的红卫兵、造反派“破四旧”行动升级,大肆破坏寺院、古建筑、古籍等文物。一时间,街道、工厂、公社、老字号商店、学校改名成风,“反修路”、“东风商店”、“红卫战校”等革命名称比比皆是,剪小腿裤、理飞机头、穿火箭鞋,揪斗学者、文学家、艺术家、科学家等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,更是随处可见的街头即景,许多原本置身度外的学生也参加到了红卫兵的行列。

新华社当时对此进行了连续、正面的歌

颂性报道。1966年8月23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好得很》:“许多地方的名称、商店的字号,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,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、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,毒化着人们的灵魂。广大革命群众,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!”“千千万万‘红卫兵’举起了铁

◀红卫兵捣毁寺庙、斗争和尚。





扫帚，在短短几天之内，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名称和风俗习惯，来了个大扫除。”

有了“尚方宝剑”，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，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：冲击寺院（甚至西藏著名的大昭寺也不能幸免）、古迹（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、孔林），捣毁佛像、牌坊、石碑，查抄、焚烧藏书、名家字画，取消修指甲、美容、摩面、洁齿等服务项目，停止销售具有“资



▲“破四旧”时，观音菩萨也被判了“死刑”。

产阶级生活方式”色彩的化妆品、仿古工艺品，砸毁文物，烧戏装、道具，勒令政协、民主党派解散，抓人、揪斗、抄家，禁止信徒过宗教生活，强迫僧尼还俗……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，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。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，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，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，甚至连老人的胡子都被当成“四旧”来革除，“破四旧”成了践踏法律、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、通行证件、神符魔咒。四川乐山背靠乌尤山、面对青衣江的大佛，通高 71

米，其巨大的体量让年轻的破坏者一时难以下手；又被乐山县一位副县长在其身上书写了“毛主席万岁”几个大字，才幸免于难。但是大佛背后乌尤寺中的五百罗汉却是泥塑的，被红卫兵尽数砸去。

佛教有所谓“在劫难逃”的说法，所以佛教徒并不认为一切都能太太平平、一帆风顺；当灾难来临时，他们会把灾难看成是自己注定的宿命而默默地承受。历史上就有过“三武一宗”灭佛的教难，即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四位帝王灭佛政策带来的四次大厄运。当时，无数的寺院、经书、佛像、法器被焚毁、破坏，数以万计的僧侣遭到杀戮，或被迫还俗。这一个个的打击，使得佛教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扼杀，几经摧残而致衰微不振。但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以后已深植民众之心，因此在遭受重重打击之后，却能始终屹立不倒。

再说，“破四旧”与历次教难的性质也很不相同，“文革”是真正的“大革文化命”，破坏对象是一切人类文明，而不是专门针对佛教的。但是“破四旧”运动加在佛教头上的一顶帽子——“封建迷信”，却让人啼笑皆非。原来汉语里的“迷信”是个外来词，它就来源于由古印度传来的佛教。佛教要用觉悟真理的所谓“正信”，来破除凡夫俗子执迷于虚妄世相的“迷信”。现在，不管大小尺寸合不合，反正几千年前自己缝制的帽子，却被人驴唇不对马嘴地扣在了自己的头上，而且影响深远。在“文革”早就结束的今天，社会上不是还有人常常用“迷信”来形容佛教吗？



大明寺的奇迹

“破四旧”运动席卷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的时候，古城扬州自然也不例外。历史上扬州城中寺院林立，可经历了那一场大劫难之后，不消说辉映在唐诗宋词里的城东竹西寺、禅智寺、山光寺等早已没了踪影，就是直到上个世纪前期还香火鼎盛的大丛林，也钟停磬歇。康熙、乾隆下江南时做过行宫，曹雪芹的祖父在其间刻过《全唐诗》、《文选》等古籍的天宁寺，成了扬州博物馆；重宁寺做了扬州国画院……至于做了机关、单位办公厅堂的，或者是市井居民栖身之所的，其中的佛教遗存也都被清除得干干净净。今天扬州最繁华的一条街，号称“唐宋元明清，一路看到今”的文昌路，马路中央尽管还散布着一些标志性的古

迹，比如王播尝尽世态炎凉的地方——古木兰院（惠昭寺），但是街心石塔上雕刻的佛像，却全部残缺不全，没有一座是有佛头的。对于佛像的此等遭遇，凡经历过“十年浩劫”的人都不会感到奇怪：在那个年代，全国各地有哪一处寺庙可以幸免？！可是你还别说，就是在扬州，居然有这么一座寺庙没受什么冲击，它就是大明寺。大明寺不仅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皆未受损，甚至还能大兴土木，在“文革”中继续建设由国内顶级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设计的纪念堂。大明寺为什么这么牛气？其时寺院里的僧侣们都是泥菩萨过河——自身难保了，那大明寺又是怎么得以保全的呢？

事实上，扬州的红卫兵已经准备对大明寺动手了。这时候从北京传来周恩来总理的电谕，要坚决保护大明寺的文物古迹，于是地

王播“饭后钟”

王播少年孤贫，流落到江苏扬州，寄食于惠昭寺木兰院，每当吃饭钟响，王播就跟随寺僧领一份斋饭。日子久了，寺里僧人对他便有些厌恶。一天，僧人们



▲王播曾寄食的古木兰院，今存石塔，在扬州市文昌中路大街当中。

故意先领斋饭，饭后再敲钟。王播听到钟响，连忙赶去，饭事已了。王播空腹而回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便在壁上题诗两句：“上堂已了各西东，惭愧闍黎饭后钟。”后王播离寺他去，发愤攻读，于贞元年间中进士，出任淮南节度使，开府扬州。王播重访惠昭寺，见当年壁上题诗已被僧人用碧纱罩起来了，对世态炎凉感慨至深，又续题两句：“二十年来坐扑面，如今始得碧纱笼。”



▲扬州大明寺栖灵塔。

方上赶紧采取了封闭庙宇的措施。全国那么多寺庙，中央领导为何独厚大明寺？因为它得到了一位大唐高僧在天之灵的护佑，这位高僧就是1973年落成于大明寺的纪念堂的祀主——鉴真和尚。

“破四旧”是一种政治狂热，只是再狂热的政治也是不可能脱离现实的。鉴真能保佑他的大明寺，不是因为和尚身份赋予了他什么特殊的法力，而是他东渡日本成了日本的文化恩人。保护大明寺，兴建纪念堂，当然体现了国家对鉴真的推崇与敬重，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处理好中日关系的现实考虑。同样是跟鉴真有关的文物古迹，浙江湖州的铁佛寺，就因为不曾引起国际上的关注，照样没能逃

过“破四旧”的厄运。鉴真东渡日本前，曾往浙江湖州的寺院讲经，并嘱咐住持僧铸一尊铁观音。宋天圣三年（1025年），铁观音铸成。900多年来，因天灾、兵祸，铁观音约有一半的时间立在风雨之中，可是它不蚀、不锈、不裂，完好如新。据近代化验，观音的铸铁中含有钛、锰、铬等元素，堪称不锈钢。红卫兵欲毁掉这尊铁观音，他们用铁锤敲、石块砸、大火烧、钢锯锯，都不成功，只好作罢。后来，几位工人将铁观音藏进煤堆，试图让它躲过这场劫难。不想八年后，一个小学就辍学的青年偶尔发现铁观音的双手是铸成后装上去的。这个愚昧的青年竟将观音的双手卸下，送到废品收购站，换了几块钱。铁观音从此成了无臂的残疾神。



大明寺可不一样，它被当做日本佛教律宗的祖庭，这时已经在中日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鉴真是唐朝时候的和尚，他怀着坚忍不拔的精神，在经历了诸多曲折和失败后，终于东渡成功，将佛教戒律和盛唐文化传到了日本。他被日本人作为恩人纪念着，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却被自己祖国的宗教史、哲学史、思想史所淡忘。就像孔子说的：“礼失，求诸野。”中国历史上许多的典章文物、真迹善本失传之后，常常在日本等地被重新发现。这次被发现的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——鉴真。与他同一朝代的另一个和尚玄奘，不但被鲁迅誉为“民族的脊梁”，他西去印度求经的故事还被小说家绘声绘色地演绎成一部《西游记》而家喻户晓。而鉴真东渡的事迹却在历史上长期湮没不彰。总算是因缘际会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鉴真被中国人重新发现，并赋予了传播佛教之外的新的意义。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曾对鉴真有这样的评价：“唐代出了两位高僧，一位是玄奘，一位是鉴真。玄奘取经是做学生去的，鉴真弘法是做老师去的。”就是这位佛协会会长，凭着高度的政治敏感，向周总理推荐了这位做老师去的唐僧——鉴真。

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：“文革”前的1963年，正是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，日本方面举行了各种盛大的纪念活动。当时中日邦交还没有正常化，而作为日本律宗祖庭的古大明寺（那时还叫“法净寺”），也还没有对外

►大明寺内的云板。云板是用来敲击发声，作为报事集众的信号。



▲劫后余生的湖州铁佛寺观音。



三武一宗教难

历史上“三武一宗”教难,是指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四位帝王的灭佛运动。

北魏为了统一北方,巩固在中原的地位,以全民为兵。而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、徭役,所以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(438年)下诏,凡是50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役。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劝谏,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,排斥佛教,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运动。太武帝的废佛行动,始自太平真君五年(444年)。当时,他下令上自王公,下至庶人,一概禁止私养沙门,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,若有隐瞒,诛灭全族。翌年,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(陕西黄陵)起义,有众十余万人。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,到达长安时,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,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,大为震怒,下令诛杀全寺僧众。崔浩趁机劝帝灭佛,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严厉的废佛政策:诛戮长

安的沙门,焚毁天下一切经像。一时之间,举国上下,风声鹤唳。史称“太武法难”。废佛后六年,太武帝驾崩,文成帝即位,下诏复兴佛教,佛教才又逐渐恢复生机。

第二次的灭佛事件发生在北周武帝之时,距北魏太武帝的灭佛,约有110余年。他的灭佛政策,主要是受到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影响。据《广弘明集》卷八记载,当时民间普遍流传着一句谶语,说“黑衣当得天下”。深信谶纬之学的武帝,对此预言非常忌讳,卫元嵩和道士张宾就乘机指沙门身穿黑衣,必为国禁,道士穿黄衣,必为国祥。武帝于是渐渐重道轻佛。天和四年(569年),先后四次召集佛、道、儒三教学者,议论教义

开放。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先生审时度势,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,向周恩来总理建言:“中日邦交正常化可通过民间促官方,佛教是很好的载体。而鉴真大和尚的题材很好,可以担任民间大使。”周总理采纳了赵朴初的建议,并经中央同意,由中日宗教界、文化界在扬州大明寺(法净寺)共同举行纪念活动。并应赵老的建议,把“法净寺”改回“大明寺”。就是说,当时被重新发现的,不仅是鉴真,同时还有大明寺的本名。

大明寺位于扬州城区西北部蜀冈风景区

的中峰,因其集佛教庙宇、文物古迹和园林风光于一体而历代享有盛名。它初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(457—464年),所以称“大明寺”。隋仁寿元年(601年),文帝杨坚60寿辰,诏令在全国30个州内立30座塔,以供奉佛舍利,其中一座建立在大明寺内,称“栖灵塔”。塔高九层,因寺从塔名,故“大明寺”又称“栖灵寺”;又因大明寺在隋宫、唐城之西,也称“西寺”。

唐天宝二年(743年),大明寺律学高僧鉴真大师应日本僧人荣睿、普照的邀请,为弘扬



▲台湾版《中国佛教近代法难研究》书影。



的高低。几次聚众议论，三教各执一词，因此悬而不决。武帝对于佛道二教互相攻击，极感不快。建德三年（574年），下诏废佛、道二教，破毁寺塔、焚烧经像，勒令沙门、道士还俗。当时，被迫还俗的沙门有两万多人，关陇一带的寺庙破坏殆尽。建德六年，北周灭北齐，武帝又在北齐之地实行排佛政策，焚毁所有经像，废四万所寺庙，被迫还俗的僧尼达300余万。北方佛教一时之间销声匿迹，史称“周武法难”。武帝死后，宣帝、静帝相继即位，佛教才又渐显生气。

唐代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，僧尼人数越来越多，并可免除徭役，寺院也越建越大。而僧尼、寺院激增的结果，不免增加国库的负担。当时不少士大夫基于儒家观点，认为佛教的蓬勃发展将危害国家的经济，因而大加抨击。唐武宗时，排佛的呼声越来越高，这使得本已笃信道教的武宗痛下决心毁佛。加之道士赵归真与宰相李德裕推波助澜，佛教因此而面临“三武一宗”法难中最大的灭佛事件。会昌五年三月，武宗敕令天下诸寺不许置庄园，并随时检查寺院的财产。四月，敕令僧尼还俗，如有抗命不从的，以违抗圣旨论罪，当场斩杀。八月下诏，大举毁寺，会昌年间，总计拆毁佛寺4600余所，被迫还俗的僧尼有26万余人，没收良田数千顷，又将佛像、钟磬等法器改铸为钱币、农具等物，私家所藏金银等像亦敕令限时送官。此一空前浩劫，历史上称为“会昌法难”。晚唐以后诸宗的衰颓不振，与这次毁佛有密切的关系。宣宗即位，诛杀赵归真等人，并大力复兴佛教。

第四次灭佛发生于后周世宗显德二年（955年）。世宗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，以佛教寺院僧尼乃构成国家财政负担为由，下诏禁止私自出家，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，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，否则无效；不许新建寺院，违反的僧尼，课以严刑；旧有未受敕额的寺院，一律废毁；民间的佛像、铜器，限50天内交由官司铸钱，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，一律处死。总计废毁寺院3万余所，大量的佛像及钟、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。相传世宗下诏毁坏佛像时，镇州有一尊铜制观世音菩萨极为灵验，因此无人敢去毁损。世宗乃亲自前往该寺，用斧头砍毁菩萨胸部。显德六年，世宗在北征途中，胸部突发痼疾而亡。

佛法，首次筹划东渡日本。其后历经十多年艰险，先后五次失败，终于在天宝十二年，也就是日本天平胜宝五年（753年），东渡日本成功。自此，中日友谊掀开了新的篇章。

唐会昌三年（843年），栖霞塔遭大火焚毁。两年后，武宗诏令毁全国大寺

►秦少游称大明寺为“淮东第一观”。





4000余所、中小寺院4万余所，佛教徒称之为“会昌法难”，大明寺未能免于此难而遭毁坏。唐末吴王杨行密兴修殿宇，并更名为“秤平”。

宋景德年间，僧人可政化缘募捐，集资建塔七级，名“多宝”。真宗赐名“普惠”。寺庙自宋末历经元朝至明初沿称“大明寺”。苏门四学士之一、扬州属县高邮人氏秦少游称赞它是“淮东第一观”。

明天顺五年(1461年)，僧人智沧溟决心重建庙宇，经师徒三代经营，规模渐复；后经变乱，塔寺变为荒丘。万历年间郡守吴秀建寺复塔。崇祯年间巡漕御史杨仁愿又重建寺庙。

清康熙、乾隆二帝多次南巡扬州，寺庙不断增建，规模逐步宏大，大明寺遂成为扬州八大名刹之首。但是，取代明朝而建立的清廷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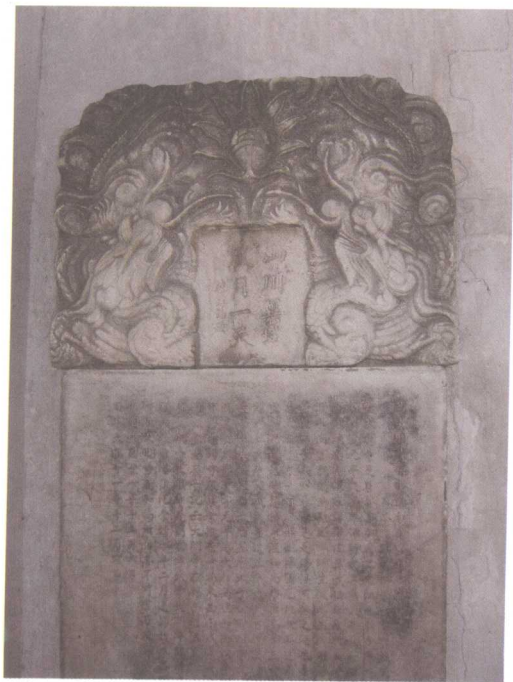
忌讳“大明”二字，怕大清治下的汉族人民起故国之思，又沿称该寺“栖灵寺”。乾隆三十年(1765年)，当高宗第四次巡游扬州时，御笔题书“敕题法净寺”(敕：皇帝号令)，于是它就成了法净寺。其实大明二字并非指大明王朝，而是南北朝时期宋孝武帝刘骏的年号，与大明王朝相隔千载。咸丰三年(1853年)，寺院毁于太平军与清军之兵燹。同治九年(1870年)，两淮盐运使方浚颐重建法净寺。

重新发现大明寺的活动，是日本人先进行的。晚清开始，由于中日两国对待西方先进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态度各异，使得两国之间在社会发展、文明演进程度上发生了彼此关系的逆转，同时也引发了在新的历史格局下相互了解、相互交流的热潮。而且新的技术条件使东渡、西游不再像古时候那么艰难，两国之间人员往来日益频繁。鉴真后学和感佩鉴真的其他日本人纷纷前往鉴真故乡寻根或凭吊。

1921年，在扬州主持两淮稽核所工作的日本专家高洲太助，经考证确认法净寺就是古大明寺，便认定鉴真就是由此东渡的。于是立“古大明寺唐鉴真和尚遗址碑”，并请日本东方文化学院院长、文学博士常盘大定撰写碑记，碑文则由扬州人王景琦所书。王景琦是清代举人，一方名士，文字功底深厚，书法功力非凡，他以正楷书写，融颜字健雄、柳字清健于一体，端雅庄严。碑由扬州著名石工黄绍华摹勒。碑头则请当时的江苏省省长、清代举人韩国钧题书，文曰“山川异域，风月一天”。

该碑碑文介绍了鉴真不凡的生平、东渡

▼古大明寺唐鉴真和尚遗址碑。





▲扬州大明寺鉴真纪念堂。

的艰难：“首途泛海，前后五次，以运蹇不果其志。凡在逆旅十有二年，饥渴困厄，难以具述。两眼失明，仍不变初念。”叙述鉴真在日传法的影响：“一时高德八十余僧弃旧授新，是为日本登坛受戒之始”；同时传播文化，“创唐招提寺，筑戒坛”，“筑戒坛同时于下野药师寺”。

该碑是 1922 年底在法净寺建立的，由于难以稽考的原因，在 1925 年被埋于地下，40 年代才又挖出，重新竖于大雄宝殿西侧面东。这十几年的地下生活使石碑躲过了兵燹战火，因而至今完好如初。这是此碑之幸，亦是鉴真之幸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法净寺被列为江苏省文

物保护单位。1963 年，又重修寺庙。两年后，红卫兵不得不忌惮于中日关系的大局，在肆意破坏各地佛寺时，唯独对大明寺网开一面。在十年浩劫中，这里却如世外桃源，并于 1973 年建成了鉴真纪念堂。

一提鉴真，日本人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

大明寺地位之崇隆，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也不敢掠其纓。区区一盲僧，为什么在排斥宗教的年代仍然能表现出这么大的“神通”？前面说了，不是缘于佛菩萨的法力，而是因为日本人民对他极度感佩和推崇。我们今天研究



和介绍鉴真,直接的古籍史料也来源于日本,中国方面的记录很少。

这很正常。鉴真东渡的年代,中国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日本。当时僧俗人等对鉴真的人品、学问敬佩不已,但对他执意赴日的行为,态度上多半是不理解、不赞成,行动上也多是挽留,甚至阻挠的。这是造成东渡航程波折不断的原因之一。鉴真一去不回,最终埋骨异乡,故国的亲朋好友痛惜之余并未觉得有大加褒扬、口颂耳传的有必要。这与为中国佛教求取真经,最终回归祖国的玄奘恰成对照,中国民间一直把玄奘西游当做惊天的传奇。

就像在技术上精益求精、道德上舍己利人的白求恩大夫,加拿大人也是通过中国才认识这位伟大的同胞的。在日本,鉴真就跟白求恩在中国一样,被人们传颂着,并因此被自己的同胞所认识。目前,我们研究鉴真直接可以利用的资料就是真人元开的《过海大师东征传》。

鉴真东渡的事迹,在唐代曾有零星记载,李肇《唐国史补》卷上即云:“佛法自西土,故



▲《东征传绘卷》,用图画演绎了元开所著的《过海大师东征传》。



▲《过海大师东征传》中文版书影。

海东未之有也。天宝末,扬州僧鉴真始往倭国大演释教,经黑海、蛇山,其徒号‘过海和尚’。”但比较完整的鉴真传记,是在日本开始传世的。最初有鉴真弟子思托写的三卷本《东征传》,这个本子已失传了,但其片断,还散见于日本其他文献中。遣唐大使丹墀真人广成的儿子真人元开著《过海大师东征传》。那是思托所著《东征传》的节本。此书着重记述了鉴真六次东渡的艰难历程,对鉴真等人经过的城邑、名利、古寺,沿途的所见所闻、风土人情,国内及海上的交通情况等都比较详尽的描述,是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有关鉴真史料中最翔实、最完整的原始资料,同时也是详尽记录唐代中日两国交通关系的最早的文献资料。日本永仁六年(1298年)有僧人莲行绘为《东征传绘卷》五卷,用图画演绎了元开所著的《过海大师东征传》,至今保存在鉴真修建的唐招提寺内。

在中国,完整的鉴真史料,最初见于宋代

